

《徐霞客游记》的语言学价值

谢智香

(厦门大学 中文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摘要:《徐霞客游记》是晚明社会的产物,它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,而且具有丰富的语言学价值。一方面,《徐霞客游记》中所记方音反映了吴语和云南方音的一些特征,所运用的一些方言词汇也表现各地方言词汇的不同;另一方面,《徐霞客游记》记录了反映诸如壮语、彝语、布衣语等许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。此外,《徐霞客游记》在地名学上有关通名的记录有其特色,采用吸取民间用语和以形状特征来定通名。在所记地名的命名法中,主要有描述性地名、记叙性地名两大类。

关键词:《徐霞客游记》; 方言; 民族语; 地名; 语言学价值

中图分类号: H 028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1- 5744(2010) 03- 0028- 05

《徐霞客游记》(以下简称《游记》)系日记体为主的全景式中国地理名著。它对山川名胜、江河源流、地形地质、城市居民点、社会动态、史迹考证以及民情风俗和少数民族生活、边陲防务等都进行了详细记述。《游记》是一部集风景导游、科学考察、文学描写、历史实录及悠久的中华文化展现于一体的“奇书”,被清著名学者钱谦益称为“世间真文字,大文字,奇文字”。《徐霞客游记》在地理学、史学、民俗学、文学等方面的价值不断被后人所挖掘。但其在语言学上的价值所论及不多,本文试就《游记》在语言学方面的价值进行探讨。

一 《游记》的方言价值

有关晚明方言,散见于各地方志、别史、文集等文献中,对研究各地方言具有参考价值。但要综合探索明代全国方言恐怕是远远不够的,还得涉猎其他一些被人们不太注意的文献,甚至还需要实地踏勘验证。《游记》作为一部名著,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借鉴。徐霞客每到一村镇,渡过一条河流,爬过一座山,都恭敬地向当地人民群众询问其称谓,然后多方核实才记录下来。研究方音虽然不是徐霞客写书的主要目的,但《游记》中所记方音、方言词汇多有所见,反映了一些语言学的价值,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。

(一) 反映一些方言的语音特征

《游记》中有些记录反映了吴方言的特点:黄

王、湖吴不分(即喻、匣母不分)。明·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卷四中说“如吴语黄王不辨,北人多笑之”,“又南音或以黄王、湖吴不分”(清·李汝珍《音鉴》凡例八),这两位前人的话指的是吴语混同了喻、匣母,仍读为全浊音。由于徐霞客是江苏省江阴县人,由于受这种方音的影响使后来徐霞客游嵩山时就把王(宕合三平阳喻)家店记成黄(宕合一平唐匣)家店、法王(宕合三平阳喻)寺记成法皇(宕合一平唐匣)寺,吴(遇合一平模喻)村记成胡(遇合一平模匣)村。钱乃荣在分析吴语音母的特点的时候也说:“匣喻母的声母在多数地方已合流。”^[1]此外,徐霞客在《游五台山日记》将王快(蟹合二去夬溪)记成王葵(止合三平脂群)也反映了“吴语基本上保存了中古的全浊声母的特点”(略有改动)^[2]。

在《滇游日记》中作者记录了很多云南方言的例子,如“(腾冲)……南香甸,余疑为‘兰香’之讹,盖其甸在北,不应以‘南’称也”。^[3]“三营亦浪穹境内,余始从鸡山闻其名,以为山阴也。……土人呼‘营’为‘阴’,遂不免与会稽之邻县同一称谓莫辨矣。”^[4]“其山一名方山,一名番山,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。其地犹大姚县属……”^[5]

从这几个方言的例子反映了云南方音的一些情况。首先是 n l 不分。像在保山,《游记》称潞江的,现在称怒江,在元谋,《游记》中称苴宁,现在称苴林。这种 [n]、[l] 不分的情形主要分布于湘方言、

收稿日期: 2009- 11- 23

作者简介: 谢智香(1972-),女,江西峡江人,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词汇、汉语史研究。

赣方言、闽方言的一部分地区以及西南官话、江淮官话等,在全国来说,同样是方音辨正的重点之一。

其次是在云南方音中[- m]、[- n]、[- ŋ]的相混。中古音中收鼻尾音的字是泾渭分明的。共三组:“潭”,“覃”韵收[- m]尾;“滩”,“寒”韵收[- n]尾;“塘”,“唐”韵收[- ŋ]尾。后来到元《中原音韵》时仍保存侵寻、监咸、廉纤(《韵略易通》改“监咸”为“緘咸”)三个收[- m]尾的韵部。就在徐霞客所处时代前后是三个收[- m]韵向收[- n]韵合并的时代。而且云南方音中[- n]、[- ŋ]相混也会在同时发生。明代万历年间本悟修订《韵略易通》一书中的“重韵”,记载了这种合并的迹象^[6]。由于[- m]、[- n]、[- ŋ]相混必然导致所有带鼻尾音的韵母统统相混。如在大姚,《游记》中称白盐井,现在称白羊井,在寻甸《游记》称花箐哨,现在称花心哨。

再次是云南方音鼻化元音的存在。王力认为:“现代许多方言里有许多鼻化元音的存在。鼻化元音一般是从带鼻音韵尾的元音发展来的。其发展过程是韵尾鼻音影响元音使之鼻化,起初元音鼻化后仍带鼻音韵尾,后来韵尾鼻音逐渐短弱以至于脱落才变为鼻化元音。即[an]→[ãn]→[ã]→[ã]。”^[7]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,导致前后鼻音方、番同音。

(二)反映各地方言词汇的不同

关于地名用字,徐霞客在比较了贵州、广西的安笼、安笼千户所、安笼铺、安隆、隆安县等地名后指出:“大抵黔中多用‘笼’字,粤中多用‘隆’字。如隆安县之类。故各从其地,而不知其地之相近,其取名必非二也。”^[8]

对于农村集市称谓,广西壮语区、贵州和云南的叫法就不一样。“贵州为‘场’,云南为‘街子’,广西为‘墟’。”^[9]如在广西考察期间,徐霞客经过或者赶上了“草墟”、和睦墟、寨墟、皇泽墟、横南墟、官坂墟、松城墟、塘岸墟、街墟、西山墟、同山墟、平地墟、油麻墟、陈坊墟、平山墟、石埠墟、天灯墟、宁墟、申墟、石步墟、桥村墟、站墟、里段墟、思洛墟、白墟、罗墟、丘墟、黄村墟、鬼岩墟、百步墟等集市。在游历云南期间,徐霞客巧遇了像牛街、兔街、马街、狗街、羊街、鼠街等农村集市。在贵州考察期间经历了牛场、狗场营、马场、羊场堡、蛇场、鸡场等许多以十二生肖命名和推算街期的集市。

对于青蛙的叫法,湖南瑶族称青蛙为“乖”,“问其蛙间诸火,则取乖者,盖瑶人以蛙为乖也”^[10]。广西竹桥村的人称青蛙为“拐”,“其山骨立路北,上有竖石如观音,有伏石如蛤蟆,土人呼为‘蟆拐拜观

音’。拐即蛙之士名也。”^[11]

二 《游记》的民族语价值

徐霞客在1637年4月,从湘南东安庙进入广西,继而由桂而黔,由黔而滇,在西南地区踏访三年多的时间,为我们留下了《粤西游日记》《黔游日记》《滇游日记》等非常具有科学价值的考察游日记。这些日记中也记录了很多反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,具体表现如下。

(一)壮语地名

在《游记》中记录了很多壮语地名,同时还解释了一些壮语地名的读音。如在龙英考察瓢岩时,“土人名曰瓢峭所之‘峭’者,即山之称也……此瓢岩也,又谓之山岩。”^[12]经过数次游山后,“溪之西,田畦环绕,辟而成坞,是曰瓢峒,以石峰缥缈而言耶?”^[13]才感悟“土人呼尖山为‘瓢’,”^[13]。这样就解读了壮语呼山为瓢的语音问题。瓢(音pǎ)、峭(音qiǎo),都是壮语“石峰”的称呼。在考察广西向武州的百感岩,“在上流者曰白岩寨,土音曰不汗,一作北岸”^[14]。

壮语称水田为那,在《游记》中有很多带“那”字的地名。如粤西那印、那吝、那贤、那伦、那炎、那良、那贡、那地、那纵、那元、那勒、那重等,都处于岩溶区较平坦的稻田区。壮语“驮”即指河流。南方温湿多水,河流密布,形成了大量带“驮”字的地名,如在《游记》中粤西的驮塘、驮柴、驮木、驮卢等。壮语称“山”为邕、巴,因村落位于山下而名村,如《游记》中的邕歹村、巴潭、巴鹅、巴吉、巴泽、巴坪哨等等。

(二)彝语地名

徐霞客在经过贵州的革纳铺时解释道“土音‘纳’俱作‘捺’,至是而始知所云‘捺溪’、‘倪捺’皆‘纳’字也。惟此题铺名。”^[15]“革纳”系彝语的译音,意为大山。亦字孔:“石梁西麓,有穴纷骄纵横如‘亦’字,故名其地曰亦字孔,今讹为亦资孔,乃土音之濶也。”^[16]“亦资孔”也是彝语的译音,意为有水的冲子。

另外,彝族称“甸”为平坝,彝语译为汉语的地名中有甸字或与甸近音字(底、迭)的地名,其含义皆为山间盆地、平地、坝子。在《游记》中出现的这类地名有龙甸、坡头甸、邵甸、甸头村、甸尾、河甸、婆兮甸、勒甸、大舌甸、广甸、忠甸、七藏甸、右甸、莽甸、湾甸、庆甸、品甸、米甸、禾甸等。彝语音译为碌、鲁、路地名,意为石头。《游记》中出现的禄丰、禄劝、禄表、路南、陆凉、鲁摆、鲁石皆得名于彝语碌、鲁、路为石。

(三)布衣语地名

在《游记》中记有都匀县的包阳、平浪,“有歧路溯水西南峡,则包阳道,通平浪”^[17],包阳,系布依语的译音,意为水井;平浪,也是布依语的译音,意思为平坦的坝子。贵州“入罗平之……抵八达彝寨会江底河”^[18]。八达,即今罗平的八大河。布依语“八”为河口,“达”为河,意即两河交汇处。这是布依语地名见于明代的例子。

三 《游记》的地名学价值

我国历史悠久,民族众多,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各异,这些反映在地名上,就是层次丰富、数量巨大的各类地名。各类地名作为实体的指称,又具有明显的“载体”特征,那就是表现了历史,记录了民族的进步或衰退,呈现了各区域的自然面貌与人文景观;就实用价值来说,地名则以无可替代的社会性,伴随着人类自群居生活形成以后的漫长岁月。我国著名地图学家和地名学家曾世英先生说:“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,它和语言中的其他专名(例如人名)有相同的特点,又有不同的特点。地名的构成有一定的语法规律,地名用字的分布和民族语、方言的分布密切相关,地名的书写和称说可能存在不同的变体,对历史地名的考释必须从字的形音义入手……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地名学的研究和语言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。……语言文字学的种种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,对于地名学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。”^[19]可见地名与语言学关系的密切。二者关系之所以如此密切,主要原因还在于地名同其他专名一样,也是以形、音、义等语言要素为载体,蕴涵着丰富的语言学资料,能为语言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。

《游记》所记地名,数以万计,不仅遍及每页每段,甚至在某些段落中的每一行,也都有类别不同、大大小小的各种地名。而从所记地名隶属的地域,更能显出《游记》作为地名资料书的非凡语言学价值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(一) 关于通名的记录

地名由专名和通名组成,通名定类、专名定位。“通名标志着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分类,记录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举措和设施……因此,通名的研究是地名学研究的重要课题。”^[20]《游记》中通名的记录有其特色。

吸取民间用语来定通名。如岩溶地貌通名天生桥,在记载昆明的沙朗天生桥:“洞上之山,间道从之,所谓‘天生桥’也……山之中空而为桥”^[21],保山县的天生桥,“余时尚不知所入岭即天生桥也”^[22]。后来他询问当地人,才知道“天生桥非桥

也,即大落水洞透穴潜行,而路乃逾山涉之”^[22]。从徐霞客的记载来看,在他以前,志书上已有“天生石梁”这个名词,民间已有“天生桥”的称呼。在《江右游日记》中就记载了“及起而行,回顾溪流,正透石而出,知其为架空之石也。余之从乐安道,初览其《志》知其城西四十里,有天生石梁……虽溪小石低,已见‘天生’一斑”^[23];徐霞客吸取前人及民间的用语,把岩溶地区由于暗河的顶板崩塌后留下的桥状地貌正式定名为“天生桥”,并记入《游记》中,直到现在还沿用。

以形状特征来定通名。“洞口为庐掩,黑暗,忽转而西北,豁然中开,上穹下平,中多列笋悬柱”^[24],“笋”与“柱”是以地理实体的形状而命名的通名,同样“坠壑成窞,小者为智井,大者为盘洼”^[25]、“石梁即在亭外。梁阔尺余,长三丈,架两山坳间”^[26]等,“环洼”、“智井”、“石梁”等都是以形状特征命为该区地理实体单元的通名。

此外,徐霞客在《鸡山志目》中,将山岳地貌“自顶而下”划分为“峰、岩、洞、台、石、岭、梯、谷、峡、箐、坪、林、泉、瀑、潭、涧、温泉”^[27]共17类,“其名词之精审,类别之概括,皆地理学者观察研究之结果,非寻常文人之所能比拟者也”^[28]。

(二) 关于地名的命名法记录

“地名作为专名的一种,用来作为单一事物(地域)的指称。……地名的命名法更多地取决于人们所感受到的客观的情状……除了那些后起的年号地名、序号地名和寄托性地名之外,早期出现的地名,大多是反映了人们对该地有关自然或社会特征的认识和分类。”^[29]《游记》中所记地名的命名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。

1 描述性地名。即叙述或描述地理实体的特征。在《游记》所记地名中,这类地名最为常见。徐霞客在描述地理特征时有三种不同的着眼点。

(1)表示地理位置的。如左坑:“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,岩石奇诡”^[30];水北,“度桥而南,山始大开,又五里宿于水北”^[31]。水北,在今吉水县南境,泷江北岸,与水南相对。兴安县的东刘村、西刘村,“溯湘南行五里,复入冈陀,为东刘村。又五里为西刘村,有水自西谷东入湘”^[32]。这几个地名都是指明该地域的方位。还有的是标明地域的距离或高度,如五里桥:“下一岭为五里桥,水始西向许湾桥”^[33]。

(2)描述自然景观的。这类地名中较多的是地形和自然地物的描述。如鹦嘴峰:“盖正南而独高者为寨顶,顶又有石如鹦嘴,又名鹦嘴峰”^[34]。象鼻山:“而插江之涯,下跨于水,上属于山,中垂外掀,

有卷鼻之势,‘象鼻’之称以此。”^[35]土壤和水文的特点也是《游记》命名的依据。如:雪洞:“既渡,南向行,水流于东,路循其西,四顾石柱参差高下,白如羊脂,是为雪洞。以其色名也。”^[36]白沙湾:“江流南抵其下,曲而东北行,抱此一湾,沙土俱白,故以白沙名。”^[37]

(3)说明自然资源的。如云南寻甸州治的后山,“昔多小黄蛇,故今以黄龙名之”^[38];邓川州凤羽鸟吊山,“每岁九月,鸟千万为群,来集坪间,皆此地所无者,土人举火,鸟辄投之”^[39];黄龙、鸟吊山是说明动物资源的,更多的是以植物资源命名的,如滇西顺宁、蒙化间有杪松哨,“以岭有杪松树最大故名”^[40];“芳子,树名,昔有之,今无矣”^[41],这是徐霞客在跨越赣湘之间的芳子树村时对村名所作的解释。

2 记叙性地名,即反映人文地理特征的地名。在《游记》中这两种地名又分为两小类。

(1)记录人物或民族、姓氏的。得于人名的地名,如湖南衡阳附近的伊山,“乃桓伊读书处”^[42],“谓昌黎公过此而始建者”^[43]的青草桥,又名韩桥;贵州的关索岭因关索得名,“索为关公子,随蜀丞相诸葛南征,开辟蛮道至此”^[44];江西贵溪的象山,“乃陆象山之遗迹也”^[45]。陆象山,即陆九渊,自号象山翁,人称象山先生。

用民族名称称作地名总是当地住过该民族,如《游记》中保山县的蒲缥,“从冷水箐西渡蒲缥……,抵蒲缥之东村,蒲人,缥人,乃永昌九蛮中二种。”^[46]蒲人,又称蒲蛮或扑子蛮,即布朗族。今贵州花溪镇的华佗佬桥,“有九巩巨石梁,南北架溪上,是为华佗佬桥”^[47],佬佬,是我国的少数民族,主要分布在贵州省,至今花溪附近的山区还有几家佬佬族。

在长期的宗法社会里,人们按姓氏聚居,《游记》中许多地名便冠以姓氏,如江西乐安附近的曾田,“其处村居甚盛,而曾氏为最”^[48];湖南道州的洪家宅,“亦洪氏之聚族也”^[49];广西兴安的邓家村,“俱邓丞相之遗也”^[50]。

(2)记载史实和传说的。如贵州的白云山:“白云山初名螺拥山,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,为开山之祖,遂以‘白云’名之。”^[51]打牛坪:“有村倚北山坡峡间,庐舍最盛,是为打牛坪,相传诸葛丞相过此,值立春,打牛以示民者也。”^[52]寒山:“寒山者,郁林西北之望也。……《九域志》越王陀遣人入山采橘,十日方回,问其故,曰:‘山中大寨,不得归。’因名。”^[53]银瓮滩:“上银瓮滩,滩东,尖崖耸削绝壁,有形如瓮。《九域志》谓:‘昔有仙丹成,遗瓮成银,人往取之,辄不得,而下望又复俨然。’”^[54]这些利用

过去有关人、地、事、物之史实传说来命名的地名,不仅可以提高地物的知名度,而且使人感受到地物的所蕴涵的文化和历史的渊源,体现出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地名中的沉淀。

《游记》“作为一部对地名学有重要贡献的著作”^[55],所记地名数以万计,对它在地名的通名记述和命名法方面,以上所述,仅是《游记》一个轮廓而已。

综上所述,由于《游记》是晚明社会的产物,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书。它涉足的是社会各个方面,我们试图从它所记载的方言、民族语、地名等方面的资料来分析其所存在的语言学价值,让我们知道《游记》也是研究语言现象的重要资料,语言工作者要重视和发掘这类有价值的资料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钱乃荣.当代吴语研究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2.5
- [2]李新魁.近代汉语南北音之大界[M]//刘坚,侯精一,孙宏开,等.中国语言学报:第八期.北京: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,1997:84
- [3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下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1058
- [4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下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965
- [5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下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863
- [6]沈建民,杨信川.也谈本悟《韵略易通》之“重×韵”[J].中国语文,1995(1):65-69
- [7]王力.汉语语音史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5:548
- [8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下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752
- [9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下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757
- [10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上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264
- [12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上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508
- [13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上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520
- [14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上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523
- [15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上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698
- [16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上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709
- [17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上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5:657
- [18]朱惠荣.徐霞客游记校注:下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

- 社, 1985 739
- [19]李如龙. 汉语地名学论稿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8 2
- [20]李如龙. 汉语地名学论稿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8 31.
- [21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850
- [22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089
- [23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74
- [24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320
- [25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736
- [26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4
- [27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182
- [28]徐兆奎. 历史地理与地名研究[M]. 北京: 海洋出版社, 1993 279
- [29]李如龙. 汉语地名学论稿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8 80
- [30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81
- [31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79
- [32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309
- [33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53
- [34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42
- [35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337
- [36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257
- [37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360
- [38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794
- [39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971
- [40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158
- [41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98
- [42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225
- [43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222
- [44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684
- [45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47
- [46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080
- [47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662
- [48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73
- [49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249
- [50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305
- [51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667
- [52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下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1004
- [53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440
- [54]朱惠荣. 徐霞客游记校注: 上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5 488
- [55]陈桥驿. 水经注研究二集[M].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1987 161.

【责任编辑 王 涛】